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八卷

1848年3月—1851年12月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夏学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八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01-006450-5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778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四十八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0 月第 2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2 插页:7

字数:534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450-5



9 787010 064505 >

ISBN 978-7-01-006450-5 定价:45.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书信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所有书信均加有序号。

2.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3.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4.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5.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部分为书信卷,包括第47卷至第60卷,收入了留传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和他们给别人(包括团体、机构)的书信。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是他们的文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书信是个巨大的思想宝库。这些书信内容极为丰富,涵盖面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其中许多精辟的见解、深邃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的补充、丰富和发展。不少书信对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发挥的闪光思想,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他们的书信是他们为无产阶级锻造理论武器的思想实验室。在书信中他们通过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切磋讨论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理论。这些书信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他们的书信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有关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绚丽多彩的画卷。这些书信展示了他们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崇高的理想抱负、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反动制度的深恶痛绝、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深切同情、对错误思潮的鲜明立场和透彻剖析;还展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趣爱好、亲情友情、对同志的关爱,特别是他们患难与共、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这些书信是研究他们生平、活动和事业的最

珍贵的资料。

本卷是书信部分的第二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至1851年底写的书信。这期间正值欧洲1848—1849年革命和革命失败后欧洲开始出现政治反动的时期。这些书信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1848年以法国二月革命为标志,一场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各主要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亲自投身德国的革命运动,在革命失败后对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进行理论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活动是他们革命生涯中的光辉篇章。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大量文章,特别是为总结革命经验写的一些重要著作,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时期的书信是他们丰富多彩的革命活动的生动记述,也是对这一时期他们写的文章和著作的重要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3月的书信表明,他们十分关注巴黎二月革命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力量的变化。对阶级力量对比的正确估量,对各阶级政治立场的科学分析,是他们制定革命策略的主要依据。恩格斯在3月28日给埃米尔·布兰克的信中分析了巴黎的各种政治力量,明确指出:“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局势越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越是倾向于大资产阶级;局势越动荡,他们就越是重新靠近工人。”(见本卷第17页)这一阶级分析贯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时期制定的策略和革命实践中。

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时任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主席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从德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并积极组织盟员回国参加革命。这期间围绕革命策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达尔伯特·伯恩施太德和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成立了一个德意志民主协会，同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的德国工人联合会对抗。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出征德国，以便在德国宣告成立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的冒险主义行动。他们在3月写的一些书信反映了这场在革命策略问题上的斗争。马克思在3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像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协会反对我们。”并告知，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伯恩施太德“开除出盟”（见本卷第9页）。恩格斯在回信中表示全力支持：“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见本卷第12页）恩格斯在3月26日给布兰克的信中说：“我们同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伟大的十字军征讨毫无关系。”（见本卷第1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3月24日前后给埃蒂耶纳·卡贝的信中揭露，德意志民主协会“实质上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声明自己不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并声明：德国工人联合会“同向法国公民要服装、金钱和武器的那些行动、声明和宣言毫无关系……它同自称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并由海尔维格先生和冯·伯恩施太德先生领导的那个协会毫无共同之处”（见本卷第13、14页）。

184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德国，直接参加德国革命。回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去各地参加民主

组织的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主力量向封建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他们积极筹办《新莱茵报》,通过这个报纸来宣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张,动员群众反封建专制,指导分散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活动。从1848年的一些书信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办《新莱茵报》克服了异乎寻常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缺少办报资金。同盟中央委员会派盟员去各地征股,恩格斯也去了家乡巴门。从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征股的艰难。他在信中说:“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但答复依然是不肯定的……。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这些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武器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见本卷第25页)恩格斯还试图用办报营利来劝说他父亲提供资金,也遭到拒绝。他在信中说:“从我的老头儿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隆日报》已经是叛逆到了顶点,他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同上)办报资金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征集到了一定数目,但还远远不够。最后马克思为了革命事业甘愿作出自我牺牲,从他父亲的遗产中拿出一大笔钱作为办报资金,终于使《新莱茵报》在1848年6月1日同读者见面了。《新莱茵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成了革命的战斗堡垒,它根据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战斗任务,揭露普鲁士反动当局的阴谋,抨击自由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维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通过《新莱茵报》指导德国无产阶级和民主力量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而且密切关注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新莱茵报》从创刊时起就表明了支持意大利人民反抗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鲜明立场。马克思在

1848年5月底写给意大利《黎明报》编辑的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意大利的独立事业，将与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殊死的斗争。我们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且要向他们表明，德意志民族将以各种方式反对那些在我国也一贯压制自由的人们对你们所实行的压迫政策。我们要竭力促使两个伟大和自由的民族团结一致并和睦相处，而丑恶的政治制度至今仍使这两个民族互抱敌意。”（见本卷第30—31页）

波兰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就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写了长篇报道。我们从1849年4月11日恩格斯给沃伊切赫·冯·利普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和马克思对波兰的关切心情，信中说：“如果您能帮我们同波森大公国的一些人士建立联系，我们将十分感激您。他们可以从当地向我们提供消息。您知道，我们对一切有关波兰和波兰运动的情况是多么关心。”（见本卷第68页）《新莱茵报》还及时报道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的情况并给予热情支持。1848年6月巴黎爆发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作了详细报道。我们从1850年6月30日马克思给流亡者会议主席的信中看到他对法国六月革命的态度和评价，信中说：“当资产阶级的所有走狗攻击六月革命时，我公开地捍卫了这些恐怖的日子，我认为，这些日子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见本卷第131页）

《新莱茵报》鲜明的革命立场，它在群众中影响的与日俱增，招致普鲁士反动当局纷至沓来的迫害。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看到，马克思申请恢复普鲁士国籍的要求遭到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拒绝，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遭到法院的传讯和警察的威胁。《新莱茵报》的革命方针也遭到资产阶级股东的不满，有的人因此退股。报纸

经常陷入经费短缺的困境。马克思在1848年11月上半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和1849年2月给恩斯特·德朗克的信中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但马克思没有被反动当局的迫害所吓倒,也没有因经费困难而退缩。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纠缠,每天都可能被捕……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见本卷第40页)恩格斯也同样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1848年8月底9月初,马克思为加强同柏林、维也纳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并为《新莱茵报》筹款,离开科隆。恩格斯主持编辑部工作。恩格斯当时因在科隆参与组织大型民众集会和发表反政府演说,被检察机关起诉。恩格斯为逃避逮捕不得不暂时流亡瑞士。恩格斯虽然暂时离开了德国,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但仍在当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没有放弃战斗,他在瑞士同当地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参加了当地的民主运动。从1848年10月—1849年1月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封书信中看到两位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马克思尽管手头拮据,总想方设法给他汇款,帮助他渡过难关,还满怀深情地说:“要我丢开你不管,哪怕是一分钟,都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自己是你的最知心朋友一样。”(见本卷第40—41页)恩格斯在信中向马克思通报瑞士的情况,还向他倾诉盼望尽快回国同马克思共同战斗的急迫心情:“像这样无所事事待在国外,什么正经事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隆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见本卷第56页)1849年1月中旬,随着恩格斯被捕的威胁消失,恩格斯回到科隆,又同马克思并肩战斗了。

1849年上半年,随着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反动当局对《新莱茵

报》编辑部成员的迫害变本加厉。5月中旬反动当局对马克思下了驱逐出境令，恩格斯因参加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追究法律责任，其他几位编辑部成员也被驱逐出境。《新莱茵报》不得不于5月19日停刊。1849年6月7日和8月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7月2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和8月24日给沙贝利茨的信，反映了马克思被驱逐出科隆和《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支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恩格斯在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具体描述了他参加德国南部巴登和普法尔茨为维护帝国宪法而发动的起义的情况，还阐明了他参加这些战斗的意义：“《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见本卷第80—81页）他在信中还表达了对于流亡在巴黎并遭受法国政府迫害的马克思的关切心情：“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处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的我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还是小得多的。”（见本卷第82页）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也同样为战友担惊受怕，告诉他普鲁士人会因为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和巴登起义，会枪毙他两次。马克思敦促恩格斯立即前往伦敦一起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

1849年8月底，马克思从法国到了英国，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同年11月恩格斯由瑞士辗转到了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的主要活动是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恢复同盟同各地支部和盟员的联系，并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

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作为《新莱茵报》的续刊，是马

克思、恩格斯为总结革命经验,凝聚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与盟员联系,提高同盟政治理论水平而采取的重要步骤。马克思在1849年12月19日、1850年2月4日、4月9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和1850年1月10日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的信中,以及恩格斯在1849年12月22日给雅科布·沙贝利茨的信中提供了关于这份杂志编辑、出版、发行和筹资等情况,为我们研究这个重要刊物和刊物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一期于1850年3月出版,先后共出版六期。刊物中最重要的文章都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其中包括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这些著作总结了革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的政治经济状况,认为在经济普遍繁荣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29页)。这一新认识在1849年12月19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也曾谈到。因此,他们认为必须修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改变斗争方式,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为未来的革命战斗积聚力量上。而以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为首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却竭力反对他们的革命策略,造成了同盟的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对维利希集团以及同他们沆瀣一气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例如,马克思在1851年2月28日给海尔曼·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在1851年7月9日给恩斯特·德朗克的信中揭露了

维利希“想用普鲁士的后备军对世界进行革命”(见本卷第 307 页)的痴心妄想。马克思在 1850 年 12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和 1851 年 12 月给法兰克福出版商海尔曼·埃布纳的信中对流亡者集团的活动和冒险勾当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通过对他们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阐明并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1850 年 11 月,恩格斯为了摆脱当时的经济困境,也为了帮助处在极度贫困中的马克思一家,重返曼彻斯特他父亲与人合办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经商。马克思开始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们从此开始了频繁通信。通信成了他们联系的主要形式。他们在通信中除了互通信息外,主要探讨在共同斗争中遇到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我们从 1851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看到,他们不仅在革命时期并肩战斗,而且在理论研究中亲密合作。1851 年马克思为撰写他的经济学巨著收集和整理材料,深入研究英国这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着重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的历史和理论以及经济危机。马克思在信中经常就这些问题同恩格斯交换看法,相互切磋。例如,马克思在 1851 年 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首次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作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对地租理论的一些新见解,并征询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在 1 月 2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见本卷第 171 页)。马克思在 2 月 3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又就货币流通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恩格斯交换意见,恩格斯在 2 月 25 日

的信中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早就应当向你答复货币流通问题。依我的看法，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混乱的流通理论归结为简单明了的基本论据大有帮助。”（见本卷第 205—206 页）恩格斯还在信中详谈了自己的补充意见。他们的合作不仅表现在对经济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上，还表现在对错误思潮的批判上。1851 年蒲鲁东的《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见本卷第 354 页）。马克思在 1851 年 8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寄去对该书内容的详细摘要，征求恩格斯对该书的看法，并商谈开展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恩格斯在 8 月 11 日前后的回信中对该书作了分析批判，10 月间又写了一篇详细评论《对蒲鲁东的〈19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在 11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这一评论给予高度评价，并为该文不能发表表示惋惜。我们从书信中看到，他们的合作还表现在，有些重大题材的写作计划是他们共同酝酿、相互启发而形成的。例如，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恩格斯在政变的第二天立即给马克思写信，对政变作出评论，把这次政变描写成一出模仿 1799 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波拿巴政变的滑稽剧：“……真好像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做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见本卷第 447—448 页）。他又在 12 月 1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建议马克思为魏德迈在纽约创办的《革命》周刊写一篇关于这次政变的文章。根据恩格斯的建议，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研究，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的书名、开篇和构思显然受到恩格斯 12 月 3 日写的那封信的启发。这些书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领域是亲密合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他们对

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

在 1851 年恩格斯写的一些书信中还提供了他在军事理论领域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珍贵资料。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后,开始广泛搜集军事方面的文献资料,系统研究军事理论。他在 1851 年 6 月 19 日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明了他研究军事的原因:“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至少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见本卷第 291—292 页)他的军事研究也得到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例如,马克思在 1851 年 9 月 23 日把他对古斯塔夫·泰霍夫《未来战争概论》一文的内容摘选和对它的评论寄给恩格斯参考。恩格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军事研究结出了丰硕果实,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 1850—1851 年的书信中还有不少有关他在伦敦流亡期间苦难遭遇的记述。当时马克思一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有时因拖欠房租而面临被赶出门外流落街头的危险,他心爱的儿子因体弱多病而夭折。马克思不仅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还经常遭到怀有敌意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攻击诽谤。贫困没有把他压垮,恶意中伤也没有把他击倒,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都置之一笑,我的工作不会因此受到片刻干扰。”(见本卷第 333 页)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摆脱困境能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了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本卷中恩格斯的许多信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材料。

本卷收入的书信绝大部分曾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7卷,少数发表于第5、7、50卷。本卷新收入了11封书信,正文部分7封:1848年7月30日和1849年4月11日恩格斯致沃伊切赫(阿达尔贝特)·冯·利普斯基,1848年12月9日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卡普,1849年5月31日马克思致《国民报》编辑部,1850年2月19日马克思致雅科布·乌尔,1850年6月25日马克思致亨利希·毕尔格尔斯,1851年3月20日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附录部分4封:1849年7月14日燕妮·马克思致琳娜·许勒尔,1850年8月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1851年10月4日—8日之间燕妮·马克思致阿马利亚·丹尼尔斯,1851年12月17日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本卷收入的所有书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2卷,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3卷,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8、13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第1辑翻译或重新校订的。